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米格尔街》中男性气概的重构

胡文萱
南华大学

摘要：《米格尔街》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V. S. 奈保尔的成名作。小说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立尼达为背景，以第一人称叙述，通过17个短篇故事，讲述了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上普通居民的故事。本文以后殖民主义视角为出发点，以后殖民理论学家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为依托，对《米格尔街》中的典型边缘男性人物形象展开分析，试图探讨作品中的边缘男性如何实践真正男性气概及个体身份建构。探索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致力于进行身份重构，通过描绘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街头上的人物和故事，展现加勒比地区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探讨这种解读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男性气概；《米格尔街》；重构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3.144

一、引言

奈保尔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印裔英国作家，被人们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于1932年出生在特立尼达。奈保尔的职业生涯始于新闻工作，后于1950年代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奈保尔的作品以深刻的评论后殖民社会、文化流离失所和人性为特征。他最著名的小说包括《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在自由的国度》和《米格尔街》。他的非虚构作品，如《抵达之谜》和《信徒中间》也探讨了身份认同、归属感和文化冲突等主题。

奈保尔在西方享有盛誉，他和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奈保尔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了许多文学奖项，包括1971年的布克奖和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于2018年去世，享年85岁。他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遗产仍然被人们所赞扬和争论。《米格尔街》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发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贫困社区米格尔街。每个故事都是关于米格尔街居民生活的片段。这本书是从一个无名的叙述者的视角进行叙述。描绘了一个分裂和分化的社会，人们对贫困和暴力仿佛已经习以为常。

霍霍巴米是当代著名的印度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圣三位一体”。霍米巴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所提出的杂糅理论。霍米巴巴理论通过殖民主义权威话语内部的杂糅性及其所带来的抵抗的可能得出这种杂糅性的文化身份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对殖民主义文本的理解^[4]：西方文化的进攻并不一定非得解释为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并吞，弱势的文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差异来发声。

使文化身份的建构成为杂糅、协商与竞争的持续过程。这种协商和杂糅的身份观念反对本质强调了欧洲殖民主义和非欧洲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融^[2]。他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一种文化杂糅的过程，欧洲文化和非欧洲文化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和交织。这表明任何文化都可能被他者改写，话语权力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比较、整合、区分和安排差异的过程。因此，文化的性质并非被抑制，而是被视为混杂的元素，并不断地被重复。

二、殖民地男性形象及扭曲原因

“他们是野蛮人，没有文化与教育。”“他们是性欲强烈的，不能克服自己的欲望。”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观念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扩张而在越来越多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于是尽管有些人可能从来都没有与殖民地的人们打过交道但对被妖魔化的扭曲形象深信不移。

奈保尔笔下的男性角色看起来大部分都是贪婪又自私，不负责任而又懒惰。比如说波普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其他人的需求。“只有娘们儿才愿意干活，男人根本不必干活。”他从来都没有挣过一分钱，一家子的生计全都依靠他的妻子，他只是在家里日复一日地做着毫无用处的木匠活。但实际上波普的一些行为又表明他是一个十分坚韧的人。他有时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帮助其他人。波普为卡普（Cap）提供了一个聪明的计划，让他成功地骗取了一辆自行车。同时他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总是会伸出援手。在故事“Man-man”中，波普帮助了一个需要医疗帮助的老人，并为他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

波普帮助了卡普骗取了自行车，但他也因此感到内疚，并主动将自行车归还给了失主。

在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殖民者通常会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被殖民地区，剥夺被殖民地区的人民自主权和文化认同。在文学作品中，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人物形象的描述和描绘往往会带有自己文化和价值观的偏见和扭曲，导致被描绘的人物形象失真；被殖民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与殖民者不同，这种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人物形象的误解和刻板印象。殖民者可能没有充分了解被殖民地区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从而导致对被描绘人物形象的误解。

三、文化的坚守者：身在井隅，心向璀璨

普遍观点认为殖民者所带来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文化遗产的断裂，从而使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男性角色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自主性，这种被支配的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自主地塑造自己的命运和价值观。^[1]他们往往无法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只能被动地接受欧洲文化的规范和定义。

但在霍米·巴巴看来，当宗主国文化进入殖民地时，它已不再是原本的宗主国文化。在与当地文化的对比、并置和转译中，它既是对原文化的再现，又在差异中确立了新的意义。而男性则在其中扮演了将文化本土化并且维护本土文化的重要角色。许多男性角色通过传承自己的文化来坚守自己的身份和认同。

例如，泰马在小说中传承了印度文化，保留了自己祖先的语言、风俗和信仰。他通过传承文化来对自己身份和文化的尊重和认同。男性角色在生活中也会通过保持传统来坚守自己的文化；哈特利在小说中保持了自己加勒比海岛民的传统习俗，如捕鱼、狩猎和制作手工艺品等，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式。他还将加勒比海岛民的习俗与印度食品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美食文化。他通过融合外来文化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身份。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角色在小说中也会通过保持自己的语言来坚守自己的文化。例如，博加特吸收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元素，例如音乐、艺术、文学和食物等。同时也吸收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和艺术，通过这些外来元素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坚持使用自己的特立尼达英语，而不是标准英语。他通过保持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自豪感。^{[5] (P8)}

男性角色在《米格尔街》中通过传承文化、保持传统和保持语言等方式坚守自己的文化，并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种文化坚守不仅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尊重和认同，也是他们在生活中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四、无声的反抗者：抗击黑暗才能点亮光明

霸权主义国家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为支撑，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干涉，控制和压迫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于是乎西方通过对话语权的绝对掌控，在世界范围内为殖民地男性塑造了一个刻板印象——即殖民地男性群体“懦弱”和“麻木”，并留下了他们在受到创伤后集体“失声”的情景。殖民地男性族裔身份重构男性角色经常通过无声反抗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许多男性角色通过隐忍来应对生活的艰辛和不公。他们往往默默忍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不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追求。在某些情况下，男性角色会选择反叛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追求自由。

例如，博加特在小说中反叛父亲的期望，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艺术和生活方式，虽然这种反叛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代价，但也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坚定。同时，博加特不仅拒绝父亲的期望，还拒绝了社会和他人对他的定义。他不愿意被人看作一个“黑人”或“特立尼达人”，而是希望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反对被社会和文化定义，追求自我认同和自主性。人物“伊莱亚斯”，在殖民统治的剥削和压迫下，坚持不懈地一次又一次地参加剑桥高中文凭考试，一己之力与殖民统治抗衡，正如伊莱亚斯所说：“哪里话，我可不是那种人，我会给你们好多钱，还给博伊和其他的哥儿们。”^{[5] (P30)}伊莱亚斯不仅仅自己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但仍然惦记着自己故土的人们。^{[5] (P31)}米格尔街里的人们也对伊莱亚斯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觉得“那孩子准能以高分通过考试”。在伊莱亚斯考试完之后人们来道贺与庆祝，这表明虽然人们没有运气也没有钱抗衡殖民统治，但其内心的希望火种并没有覆灭。男性角色在生活中经常使用幽默来消解压力和疏解情绪。他们通过幽默的方式来对抗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展现出自己的机智和智慧。例如，波普在小说中通过讽刺和幽默来反驳别人的批评和指责，展现出自己的反抗意志和智慧。

总之，男性角色在《米格尔街》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无声反抗，这种反抗不仅是对生活的回应和应对，同时也体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社会中男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

五、温情的守护者：持善前行，持爱守护

刻板印象话语建构的目的是殖民者试图把殖民主体（colonial subject，又译“殖民臣属”）固定化，以便完全彻底地了解并控制他，因为对对象客体的知识把握就意味着为进一步的实际控制准备了条件。殖民者建构刻板印象就是要达到全部掌控受殖者的目的。

在《米格尔街》中，黑人男性往往被描绘为好斗、暴力和危险的人物。例如，小说中的波普就是一个好斗的黑人男性，他常常与别人打架，并且有时会使用武器。这种刻板印象源于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黑人男性被认为是野蛮和未开化的。虽然波普被描绘为好斗和暴力的人物，但是小说中也揭示了他的脆弱性和困境。例如，波普父亲的死亡和母亲的离开使得他变得孤独和无助，他的好斗行为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脆弱性。人物“大脚”，身材高大，肤色黝黑。被米格尔街里的人们形容为从不狂吠而用眼角瞅人的恶犬，甚至有人称他为爱搞恶作剧的滑稽小丑。^{[5] (58)}但在最后一场对弈时，尽管具有能够战胜对手的实力。但在听到对手是皇家空军的拳击冠军后失去自信，最终落败。最后“大脚”泪流满面，像个孩子。

其次，男性角色对家庭的热爱也是温情形象的一部分。在小说中，男性角色们都非常珍视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对于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们。例如，在博加特的故事中，男孩们经常在家里帮忙做家务，为母亲和姐姐们分担家庭负担。在哈特的故事中，男孩们为了帮助他们的父亲，一起努力赚钱来买一顶新帽子。这种对家庭的热爱表现出了男性角色内心中柔软的一面，也让他们显得更加温情和人性化。

就像赛义德笔下的西方人眼中的阿拉伯人一样般矛盾多变。种族主义者在对待黑人的态度就是如此：“黑人既是野蛮人（嗜血成性的）又是最顺从、最值得尊重的劳动者（食物的种植者）；他既是荒淫无度的性欲的化身，又如孩童般天真；他既是神秘的、原始的、纯朴的，又是最世故最老练的骗子、社会力量的操纵者”^[2]。殖民地的男性并不如殖民者们所描写一样“残

暴，冷血，愤慨。”在经过仔细的分析后可见其内心的柔软与温情。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米格尔街人们内心深处的善意和他们身上的劣根性一样闪闪发光^[3]。

六、结语

一直以来，男性气概在《米格尔街》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和议题。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族背景，他们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也各不相同。通过对这些男性角色的描写和分析，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加勒比地区的男性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它们与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的关系。其次，对《米格尔街》中男性气概的解构式解读还可以帮助读者分析和理解小说中的性别角色和身份议题。这种性别角色和身份的建构和表达，反映了加勒比地区社会中的性别和身份不平等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此外，对男性气概的解构式解读还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背景，他们的行为和态度也受到了不同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小说中，印度裔男性角色往往被描绘为节俭、保守和传统的形象，而非裔男性角色则往往被描绘为开放、激进和具有反叛精神的形象。这种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反映了加勒比地区的多元文化和多层次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男性角色在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中的不同表达和建构方式。

参考文献

- [1] 陈建琦. 《米格尔街》与殖民文化中的生存忧患和焦虑[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4(05): 118-121+128.
- [2] 罗如春, 董琳钰. 殖民主体的后殖民解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3(05): 141-146.
- [3] 李明珠. 试析《米格尔街》中底层人的价值观[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5(06): 40-43.
- [4] 薛欢. 杂糅文化下的身份危机——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为例[J]. 现代妇女(下旬), 2013(11): 228-229.
- [5] (英) V. S. 奈保尔著. 米格尔街[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06.

作者简介: 胡文莹, 女, 2003.4, 汉, 湖南岳阳学历, 本科, 研究方向(所学专业)英语语言文学。